

FINANCIAL STATECRAFT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enn Steil
Robert E. Litan



金融外交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金融武器

(第二版)

(美) 本·斯泰尔 罗伯特·E.利坦 著

黄金老 刘伟 曾超 译

黄金老 校

经济瞭望译丛

FINANCIAL STATECRAFT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enn Steil

Robert E. Litan



金融外交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金融武器

(第二版)

(美) 本·斯泰尔 罗伯特·E.利坦 著

黄金老 刘伟 曾超 译

黄金老 校

辽宁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6-2007-65 号

Benn Steil, Robert E. Litan: Financial Statecraft: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pyright © 2006 by 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DUFEP is authoriz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is bilingual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Unauthorized export of this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f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翻译版由 Yale University Press 授权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销售。未经授权的本书出口将被视为违反版权法的行为。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外交：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金融武器 / (美) 本·斯泰尔 (Steil, B.), (美) 罗伯特·E. 利坦 (Litan, R. E.) 著；黄金老，刘伟，曾超译. —2 版.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8
(经济瞭望译丛)
ISBN 978-7-5654-1881-5

I. 金… II. ①斯… ②利… ③黄… ④刘… ⑤曾… III. 美国对外政策-金融政策-研究
IV. F837. 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0971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教学支持：(0411) 84710309

营 销 部：(0411) 84710711

总 编 室：(0411) 84710523

网 址：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dufep@dufe.edu.cn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字数：201 千字 印张：14.75

2016 年 8 月第 2 版 201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 季 刘慧美 责任校对：惠恩乐

封面设计：冀贵收 版式设计：钟福建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11) 84710523

译者前言

运用金融外交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

2008年6月本书中译本出版之时，我以《探索中国的金融外交之道》为题作序，分析了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金融机构开放和储备资产运用等四个关键性的金融外交政策。大约8年时间过去了，世界与中国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1世纪的头10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世纪”，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中国商品畅行无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更加依赖中国。那10年，全球对中国经济的攻击就聚焦于一件事——要求“人民币升值”。由国际社会烘托出的人民币升值氛围，反而利于中国引进外资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当然坚决、渐进地满足了西方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中国与世界相安无事。

近5年来，美国依靠美元国际货币地位、零利率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刺激股市以及实体经济的韧性，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保持了头号金融大国的地位。欧元区饱受数次债务危机的打击，且内部各国危机程度深浅不一，仍然依靠量化宽松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日本因较低的债务率和复杂的金融产品较少，免受危机的首波冲击，并实施了

极具扩张性的安倍经济学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地位没有下降。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国家经济依靠中国需求，上了一个台阶，但后劲乏力，基本在走下坡路。金融危机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中国以全球经济的拯救者面貌出现，中国需求支撑了全球的资源价格，支撑了全球的奢侈品市场，支撑了全球的金融稳定，但现在正面临经济持续减速的巨大压力。总之，当今世界，随着全球能源资源格局、贸易投资格局、产业结构格局的变迁，美国等发达国家重拾经济金融压倒性优势，新兴经济体处于弱势地位。美国通过 TPP、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安全审查、反倾销、民族利益、反洗钱等新旧手段，发起并鼓动相关国家和地区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围堵中国。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明显增多。

金融力量早已成为大国外交中一种更加有效的武器，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正如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计划处主任戴维德·戈登（David Gordon）所说，“此前金融实力是外交实力和防卫实力的源泉，属于‘幕后英雄’。但在全球化导致世界相互依存度日趋提高的背景下，金融实力的作用已经提高至可与军事实力并驾齐驱的水平”。

美国一直是金融外交政策的坚定信奉者，也是金融外交领域的资深玩家。美国是世界经济金融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主导性国家，拥有全球最深厚的资本市场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有句名言：“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民；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近 30 年来世界政治经济金融领域的很多大事件，背后都有美国金融外交和维护美元霸权的影子。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贸易逆差大幅增长，财政赤字剧增，1985 年美国主导通过了“广场协议”，开启了美元贬值之路，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 40% 以上，有力提振了美国经济；2002 年，伊拉克开始以欧元替换美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一些欧佩克国家响应；2003 年，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有观点认为维护美元石油结算货

币地位是重要诱因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元金融霸权地位削弱，次年，欧债危机爆发，欧元失去了趁势做大的最佳窗口期，欧债危机中，美国评级公司下调希腊等国评级是重要导火索。

金融是美国核心竞争力，美国对金融业的维护总是不惜一切代价。2011年9月，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袭扰金融界，并在一个月内迅速升级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运动。美国政府则不惜违背其“自由”和“民主”形象，出动警力强力打击，累计逮捕8 000余人，平息了事端，维护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中的地位。类似的反金融群众运动在希腊等欧陆国家绵绵不绝，重创欧陆金融中心地位。

过去，中国只是世界金融舞台边缘的沉默者，今天，中国已经立于世界金融舞台的中央。经济总量、金融总量都已位列全球三甲。自2003年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以来，中国就已经登上了全球金融外交领域的舞台。近年来，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货币互换协定、自贸区、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外交战略和举措不断推进。但总的来说，中国在金融外交领域仍是新手。

一、充分珍惜强金融实力的机会窗口

我在《探索中国的金融外交之道》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外交、金融外交有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中国金融实力显著增强。例如，2015年1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33万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日本；又如，按市值计算，四大国有银行的全球排名都能进入前10；再如，以市值规模计，2015年中国A股市场市值52.13万亿元，已是日本的1.54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5.41万亿元，全球最大。同时，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也有了显著提升：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由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5年12月1日，IMF批准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2016年1

月 27 日，IMF 份额改革正式生效，中国份额占比从 3.996% 升至 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些实力使得中国已有条件利用金融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运用金融外交提升大国地位的时机趋向成熟。

一方面，中国超强的金融实力基于 2001 年加入 WTO 后经济快速发展而形成，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尤其是银行业资产规模和国家外汇储备资产规模庞大。中国金融市场多元化程度和深度不足，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尚未成型；金融机构产权多元化程度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等方面均处于初期阶段。中国超强的金融实力更多地源于国内充裕的资金来源和强劲的资金需求。然而由于人口老龄化、利率市场化和投资理财工具多样化，廉价储蓄时代行将结束，银行今后的筹资能力将更多地取决于它的定价承受能力和负债创新能力；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高投资和高融资恐难再现。银行业的盈利增长和资产增长，都在较快减速。出口增速的下降，也会使外汇储备资产不再大规模增长。也即，中国超强的金融实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强金融实力的机会窗口正在展现。

另一方面，大量的国家利益需要金融来维护。中国年对外直接投资已达 1 000 亿美元以上，中国金融业已在海外设立了上千家分支机构，海外贷款余额超过 1 万亿美元。中国在海外已有巨大的金融利益，迫切需要积极推动金融外交，从游戏规则的接受者向游戏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转变，保护本国利益。2015 年 11 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因拒绝了透露中国境内客户信息的不合理要求，被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家法庭裁定为藐视法庭，并称要进行巨额罚款；2016 年 2 月，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以涉嫌参与大规模洗钱活动为由，突袭了中国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可以想象，美国等正在积累中国银行业有关所谓不合规运作的资料，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开出巨额罚单。还有，2008 年本书中译本出版时，恐怖主义对中国人来说还是电视上“外国的事情”，但今天恐怖主义不再是外面的世界，已实实

在在地在我们身边发生。美国正是严格执行本书所倡导的“切断恐怖主义的资金联系”，而达到这几年治下太平。

中国必须充分珍惜强金融实力的机会窗口，善以运用，以金融实力提升中国大国地位和影响力。

二、中国“重资产”型金融外交发力

“重资产”型金融外交，即实打实地对外投钱，借以达到金融本身的目的（维护中国金融利益）以及非金融的目的（维护中国整体国家利益）。购买美债是典型的“重资产”型金融外交。2015年中国持有的美债余额尚有1.25万亿美元。增持或出售美债，会对美元汇率和美债价格进而美国财政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购买美债将资金集中在单一资产上，中国承担的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政治风险也大。近年来，这种“重资产”型金融外交工具正在多元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承担紧急救助使命的国际性组织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大型跨国银行自身不保，中国金融实力趁势崛起。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对外贷款和投资、发起成立多边合作开发机构等一系列方法和举措崭露头角。

一是签订货币互换协议。2009年3月11日—2015年4月10日，中国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其中，中国香港地区（4000亿元）、韩国（3600亿元）、欧元区（3500亿元）、新加坡（3000亿元）、英国（2000亿元）、加拿大（2000亿元）、澳大利亚（2000亿元）、巴西（1900亿元）、马来西亚（1800亿元）、瑞士（1500亿元）、俄罗斯（1500亿元）和印尼（1000亿元）均高达千亿元以上。这些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和地区（组织）既有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包括东南亚国家和俄罗斯、蒙古等邻国，还包括欧洲央行，凸显了人民币的影响力。

二是扩大对外贷款和投资。对外贷款和投资也是“重资产”型金融外交的一部分。截至2015年9月，中国金融企业对外贷款余额为4945

亿美元。虽然，从目前实践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对外贷款有投入大、风险大、收益期偏短的特点，但是，从另一方面讲，相比于购买美债，这些政策性贷款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这些政策性贷款的主要对象是一些不发达国家的项目，还能带动中国产品（成套设备）的出口。

对外投资比对外贷款的影响力更大。作为股东（或者潜在股东），会计服务如能跟上，就可更有效地掌握信息，避免一些陷阱。同时，股权可以带来控制权，也可以更好地促进与当地合作：一方面合资企业更易于被本地大众接受和信任；另一方面，本地股东更了解当地法律、风俗、人文等情况，能弥补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初期的经验不足。截至2014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余额达到8 826.4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 450.2亿美元，有了长足的增长，但距离美国4.59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仍有不小的差距。

三是组建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涉及设施联通、资金联通、贸易畅通等各个方面的合作，为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提升整体金融外交实力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平台。围绕“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加速推进货币互换、成立丝路基金（400亿美元），并主导组建了金砖银行（中国出资410亿美元，占总投票权的39.95%）和亚投行（中国出资297.804亿美元，占总投票权的26.06%）。

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建设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多边国际金融组织“忘了初心”、不作为的一种纠正，是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金融保障，也是中国金融外交从“无为”走向“有为”的重要标志。

三、拓展金融外交新空间

“重资产”型金融外交耗资巨大，并且对外交的作用不能持续，一旦资金耗完，或者当地政府政权更迭，就停下来了。中国要重点拓展“轻资产”型金融外交。更高层次的金融外交工具，在于货币国际化、金融监管国际规则制定权、独立的跨境资金清结算体系、跨越国界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等。

1. 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当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本国货币政策就具备了全球影响力，会大大提升金融外交的实力。近年来，受益于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的持续贬值压力，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2015》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已经从 2009 年年底的 0.02% 提高到 2014 年年底的 2.47%。同时，也要看到，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能寄希望于朝夕，需要有政策耐心，先要筑基，着力在深化金融改革、完善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上持续推进，基础夯实后，人民币国际化更多地会是水到渠成之事。

首先，有的放矢地开放资本市场。资本项目开放是一个非时点概念，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正式对外宣布其资本项目完全开放。开放的顺序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不同项目开放程度的深化问题。当前，国内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性工具所占比重较低，股票和债券市场缺乏足够深度来容纳国际资金进出；理财投资产品刚性兑付仍占主流，金融风险文化不健全，国内投资者仍缺乏正确的风险观；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也处在相对初级阶段，风险对冲工具严重匮乏。此外，国内金融体系国际化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金融机构刚开始走出国门，国际化经验和进展不足；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也缺乏国际性企业的参与，国际投资者认可度不高。上述种种，使得国内金融市场深化改革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在此之前，并不适宜完全放开可兑换资本项目。

其次，协调发展在岸、离岸两个市场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使得人民币金融产品客观上形成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受资本可兑换程度等因素影响，在一些产品上，两个市场是割裂的。在人民币利率类、股权类金融产品上，国内市场开放程度有限，导致国外相关金融产品匮乏；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远期等产品上，离岸市场较为发达，交易量大，已经对在岸人民币汇率产生了显著影响，加大了人民银行管理汇率波动的难度。国内市场在人民币利率、汇率及大宗商品等相关衍生金融产品建设上，还可适当加快步伐，要在体量上远超离岸市场，牢牢把控定价权。同时，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体系仍有待丰富，可以以自贸区为基础积极试点，不断丰富境外人民币资产回流渠道，为离岸市场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提供支持。

再次，充分发挥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要成为像美元一样的霸权货币，实际上也缺乏成为霸权货币的历史机遇。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首先是成为亚洲的区域性货币，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与经济实力相当的影响力，成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人民币将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加入 SDR，在此之后，中国可推动相关友好国家增持人民币资产；依托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平台，充分发挥人民币在对外援助、基础设施投资和多边合作中的作用，同时，择机推动 IMF 份额改革，进一步提升人民币份额，并推动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等。

最后，要做好持续发力、长期推进的思想准备。从历史上看，货币的国际化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早在 1880 年左右就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直至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元才取得货币霸权地位。从这个角度看，美元国际化走过了 60 年的时间。日元的国际化也是如此，即使从 1980 年开始算起，日元国际化也历经了 30 年。欧元脱胎于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强势货币，其国际化进展较快，是目前唯一可以对美元构成潜在竞争压力的货币，但欧债危机的爆发基本打

乱了欧元快速国际化的节奏，未来也有较长的路要走。同样，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遇到一定的波折。自 2014 年以来，美联储通过不断发酵的加息预期导演了美元的升值走势，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汇率纷纷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先后出现了两次快速贬值，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第一波始于 8·11 汇改，人民币汇率自 2015 年 8 月 11 日开盘价的 6.2093 迅速贬值到 6.4485，贬值幅度高达 3.85%；第二波贬值趋势于 2015 年 11 月中旬形成，于 2016 年年初很快达到新的高点 6.6042。人民币国际化是个系统工程，也是长期过程，遇到波折实属正常，我们需要做的是目标坚定、持续发力，做好长期推进的思想准备。

2. 影响资本市场估值

在这方面，有两块“基石”。基石一是会计规则，涉及对资产、负债和权益的确认。目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均为美国公司。基石二是评级公司，涉及对金融工具的定价和投资者信心。两大评级公司均为美国公司。中国在会计规则和评级公司等金融市场“基石”方面缺乏话语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就容易受制于人。2011 年开始，美国浑水和香橼公司频繁做空中概股，一度引发投资者对中概股的信心崩塌，相关公司股价大跌，损失巨大。2016 年 3 月初，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中国 38 家国有企业及授予评级的子公司、25 家金融机构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试图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的预期，进而影响国际资本流向。2014 年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国家制裁，评级公司相继降低俄罗斯和俄罗斯公司的信用评级，引发投资者逃离俄罗斯，加剧了制裁的效果。为此，俄罗斯“不得不”于 2015 年 7 月宣布组建国家信用评级公司，以期本国公司受到“公平”的评级待遇。

目前，中国在这方面与美国差距依然巨大，亟需加强制度建设。上海证券交易所可开设“一带一路板”，允许一些国家的合格企业来华上市。同时，以此为契机，鼓励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为这些来华上市的外国企业提供会计服务。在熊猫债的发行过程中，若境外发债主体信息披露当中的

会计准则按照中国的准则来做，评级信息也以国内评级机构为主，也是提升国内会计准则和评级体系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同时，逐步放开外国资本投资 A 股市场的限制，提高 A 股市场的活跃度和国际影响力。2015 年，人民银行拟发八张民营个人征信公司牌照，民营评级公司牌照也应在开放之列。这些都将有利于提升中国金融外交综合实力。

3. 力求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美国借金融反恐战、查税风暴等，在全球推行 FATCA 法案，要求签约国家允许美国税务机构向签约国银行中的美国公民账户征收所得税，同时执行银行信息自动交换，向美国税务机构提供银行中美国公民账户信息。目前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以及人们熟悉的所有海外低税或离岸的区域都已经正式或有意向与美国签署协议，包括瑞士等传统账户保密国家，传统的资产管理中心受到重大打击，全球富人正在寻找新的资产管理中心。

当账户保密不再成为差异化优势时，经济基本面、金融市场稳定性等将成为决定富人资产存放地的重要因素。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经济基本面依旧稳健，金融市场相对稳定，发展前景良好，投资机会很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引领下，中国股权投资市场蓬勃发展。截至 2015 年年底，股权投资市场活跃的 VC/PE 机构超过 8 000 家，管理资本量约 5 万亿元人民币。同时，债券市场大幅扩容，产品日趋丰富，收益率普遍高于其他国家。2015 年债券市场融资高达 23.02 亿元，同比增长 88.84%，助力中国债券市场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同时，人民币汇率在经过两次大的贬值之后，贬值风险因素也已大大释放。

可以预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将日益成为全球富人理想的资产管理地。2015 年，沪港通放行，境内外资本市场已在特设管道内打通。对已经部分开放的资本项目，如非居民用人民币投资境内银行间市场，可进一步放宽投资主体和额度限制；对于尚未放开的资本项目，可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小规模试验，逐步推动，助力中国成为新的资产管理中心。

4. 建立人民币跨境资金清算结算体系

这方面，也有两块“基石”：基石一是 SWIFT，即银行间清算系统；基石二是账户，决定资金能否进入银行体系。美国金融反恐战的主要工具就是监控银行账户和 SWIFT。高效完备的清算网络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建设，近年来，尽管央行已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法兰克福、伦敦等地建立跨境人民币清算安排和清算行，但距离完备成熟的国际货币清算体系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另外，境内外融资渠道有限、人民币资金的不完全自由流动等客观现实也限制了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的发展速度。

目前，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现有的人民币跨境资金清算结算体系已无法有效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这要求中国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资金清结算系统，完善人民币全球清算服务体系。2012 年年初，人民银行决定组织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简称 CIPS），整合现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效率，满足全球各主要时区人民币业务发展的需要。系统首期已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上线。未来，需进一步增加参与行数量，并加快推动系统二期的上线。

5. 参与制定金融监管国际规则

巴塞尔协议是目前认可度最高的银行业通行规则，这个协议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可以说是美国金融外交的典型案例。“巴塞尔协议Ⅲ”的草案于 2010 年提出，并于当年的 G20 峰会上获得批准实施。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要求和 G20 峰会达成的决议，巴塞尔协议成员国应从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但是，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业受到重创，难以满足巴塞尔协议的相关指标要求，使得美国对巴塞尔协议的态度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2012 年 11 月，美联储同意无限期推迟“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2013 年 5 月，伯南克表示，“巴塞尔协议Ⅲ”不足以解决银行“大而不倒”的问题。

2012年9月，我访问美国银行同业时，花旗执行董事 Carl Stocking 认为，“巴塞尔协议Ⅲ”尚不成熟，在过渡过程中需要不断修正完善，过早执行意义不大；同时，其部分条款对很多业务过于苛刻，对部分传统业务（如贸易融资等）的风险资本要求较高，不利于经济增长，拖累经济复苏。富国银行国际业务总裁 Greg Bajak 认为，美国对“巴塞尔协议Ⅲ”的态度与欧洲有所不同。美国银行业普遍认为“巴塞尔协议Ⅲ”尚需进一步细化与完善，执行“巴塞尔协议Ⅲ”，银行股东（投资人）被迫增加了成本，银行业的商业模式也需要改变，长期盈利能力会受到影响。

金融业的国际规则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而这种变化体现了各国基于本国利益考虑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最终是各国博弈的暂时结果。所以，中国可努力使今后的这种行业规则的变化在尊重行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更加有利于自己。在这里，德国的一个例子可以作为参考：在修改巴塞尔协议时，德国利用自身的影响，成功说服了委员会对住房抵押贷款给予 50% 的风险权重。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投资，由于中国直接融资市场还不发达，企业投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企业高负债率必然与银行高杠杆率对应。设定过高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银行融资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就被削弱了。对于中央投资企业、贸易融资、股权及实业投资、贷款承诺等风险权重计算更要考虑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中国是全球第二贸易大国，并且贸易利润十分微薄，贸易企业严重依赖债务融资，信用证等贸易融资按照 100% 信用转换系数计算，银行就会放弃贸易融资，从而严重制约中国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必须制定“中国版”的“巴塞尔协议Ⅲ”。

6. 投资当地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支付清算系统、征信系统、交易平台、托管系统等，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传统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自身很多基础设施如 IT 系统等都来自国外，与西方国家比，国内企业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缺乏话语权，也缺乏竞争力。同时，政治因素也为

国内企业参与西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阻碍。例如，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参与了海外一些一般基础电信设施的建设，在技术上是过关的，却时常被美国等国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与重大项目失之交臂。

相比传统金融项目，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状况较好，某些方面甚至超越美国。随着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到来，海外一些国家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也将更新换代，为国内企业参与其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机遇，甚至是“弯道超车”的机会。如果中国的银行、硬件制造商和互联网支付软件提供商能把握时机，携手合作，参与到海外支付清算系统、征信系统、交易平台、托管系统的建设中，一方面会为中国企业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当地金融活动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当地金融市场与中国金融市场更高效地衔接，从而间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and 扩大中国的金融影响力。具体策略上，为规避政治因素，可以效仿华为等企业，先期围绕“一带一路”等战略在东南亚、东欧等国家积极布局，之后逐步外延至其他国家，直至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7. 助推互联网金融跨国发展

互联网金融是指依托于社交网络、手机 App 等互联网工具，实现支付、投资和资金融通的一种新的金融形式。中国企业具有在海外发展互联网金融的优势。根据标准普尔 Capital IQ 的数据，截至 2014 年，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占六家，中国占四家。这意味着，在这个领域，中国仅略落后于美国，超过了欧洲和日本。阿里巴巴、苏宁等有实力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是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基础。

中国电子商务（包括互联网金融）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而这一发展过程现在成为一种优势：前些年，正是因为中国原有的商业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够完善，诚信体制相对而言也不够完善，中国互联网企业才不得不摸索并逐渐建立起一个“网上的信用体系”（支付宝、易付宝式的第三方暂管资金、客户网上评价、如何与物流企业合作等），用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并客观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和快速发展。世

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商业体系、信用体系都不够完善，按传统方法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善这些体系，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为其提供了最可借鉴的经验。中国在商业领域原来的劣势（与美国相比），在互联网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一种在海外发展的优势。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传统银行担当资金“第三方的存管”，互联网企业负责业务拓展和技术维护。在海外发展互联网金融时，可尽可能使海外业务与国内业务使用同一平台，或技术端口易于对接。这样长期上将有利于各国与中国在金融乃至贸易领域的交流。

四、国家的作用

1. 做好顶层设计

金融是保障实体经济正常运转的核心部门，各国政府对国外金融机构“走进来”都颇有戒心，往往会设置苛刻的条件。中国作为全球范围内快速崛起的大国，在政治经济各领域发挥着日渐重要的影响力，容易成为相关国家“重点关照”的对象。中国要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需要国家做好顶层设计，减少金融机构“走出去”的障碍。

一方面，要让国际社会了解并感受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尊重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力图避免给其他大国造成“闯进瓷器店的大象”的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呼吁并推动一些金融领域“游戏规则”的改革，使之反映现实情况和实力的变化，使这些必然会逐步发生的新变化在宏观上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在微观上有利于中国金融机构获得参与优质项目的平等机会。

2. 切实保护境外中资金融机构的合法利益

当前，金融机构“走出去”面临着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以跨国银行被罚款为例，近几年，此类事件日益增多。2009年，美国政府掀起查税风暴，瑞士银行被罚款7.8亿美元，并交出了所有美国人的秘密账户记